

陈残云自选集



花 城 出 版 社

陈残云自选集



花 城 出 版 社

陈残云自选集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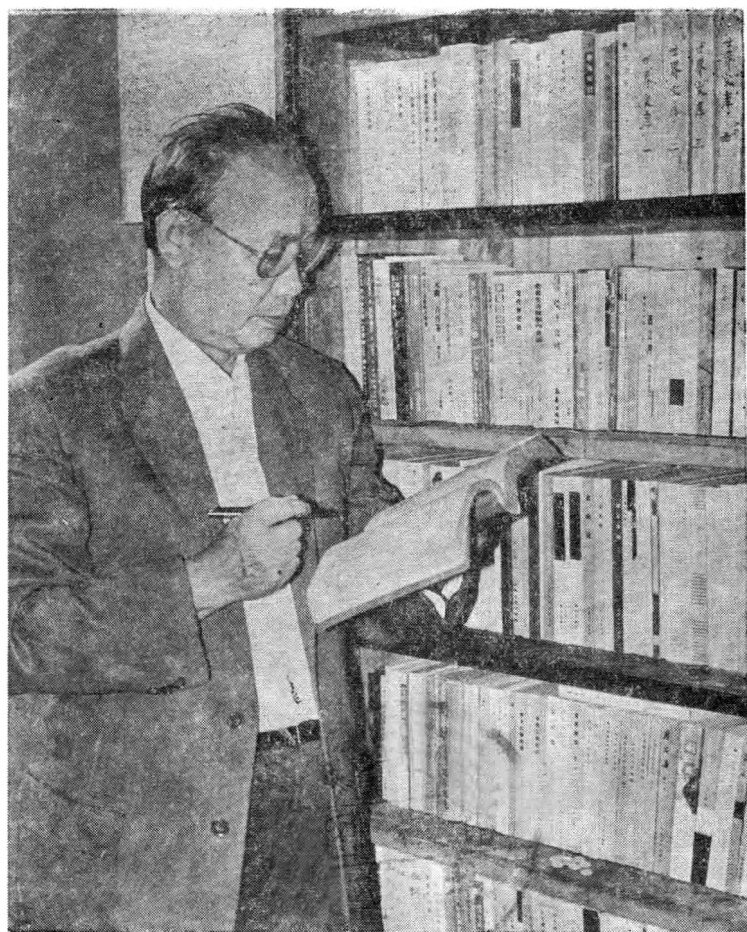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28印张 4插页 600,000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400册

书号 10261·288 定价 3.00元



作者 近 照

她是不星遇了难！我替为。对十多位
被炸死炸伤的人，我都察看过，没有她，
是不是埋^没在倒塌³的~~果~~乱木堆里，或埋没在
翻起的泥土里！不知道。我在就近的林子
里高声叫喊：“阿嫂，阿嫂——”没反应。
到底星失踪了，走了，^深在林间穿过去了，
或死了，都无法断定。我果坐等站了半晌，
为遽尔相遇的可憐的乡歌仍不幸遭遇而不
安和难过。

几位英兵走来，把站有的囚徒都叫了
去，我也跟着他们去。走了几百公尺路，
见到一个大车站，也被炸得七零八落。
站上的房舍倒塌²塌了，旁边的“土”铺子也
毁了，啤酒、汽水，饼干和各種各样的食

作者手迹

（《异国乡情》原稿中的一页）

序 言

一九三五年没有进入大学之前，我是香港一间小作坊的店员，我爱上了新文艺，读了较多的小说和新诗。我胡乱地读着，不知道哪些作品是进步的，哪些是不进步的，自己感到有兴趣就读下去。读多了，我从书本中获得了启发，发现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从而思想上发生了苦闷，对不合理的社会发出朦胧的憎恨和咒骂。于是，我直笔笔地写了一篇抒发个人苦闷的短文《一个青年的苦恼》，以后又借用黄包车夫的身份，写了一篇较长的《黄包车夫日记》，发表于香港《大光报》的副刊上。

那时，我是初学作文的文艺小青年，不懂什么叫思想主题，也不懂得表现方法，只是有感而发，连文句都不大通顺。文章所以能够发表，可能是它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纯真感情，其次是当时香港的报纸副刊大都刊登一些文言文，白话文还是一种革新的文体，适应了新派编辑的口胃。而那位编辑是谁，我不知道，感谢他带引我走进了新文艺领域。

以后，我写了一些意境朦胧的小诗，投寄到上海、广州的报刊，有些发表，有些没有发表。跟着，我回广州考进了大学，脱离了劳动者和小市民群生活，走进了知识分子的行列，

参加了进步的新诗歌运动，被看作为“年青诗人”。在抗日战争中，我除了写点散文和报道性的文章之外，主要是写诗。这当中，自费出版过一本小诗集《铁蹄下的歌手》，其余的诗都发表于报纸和刊物，写的都是短诗，分别发表于《中国诗坛》、《文艺阵地》和其他报刊，其中最长的组诗《海滨散曲（十首）》发表于《文艺生活》。

我首先提起诗作，是因为我在文坛上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写诗的，而这本选集没有选诗，可能有人说我抛弃了自己的旧作。不是的，我很重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很珍惜自己的诗作，虽然写得并不出色，但它凝聚了我年青时代的真实而强烈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有些诗如《清晨小唱》、《海滨散曲》、《母亲底歌》、《木棉花又开了》、《农村短曲》等等，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感人之处。而选集中不选它，另有原因：（一）过去的诗作手上留存的不多，就现存的选择一些，缺乏代表性，也看不出诗的特点；（二）以后准备对旧作进行搜集，尽可能把主要的诗作都结集起来，出版一本诗集，力图使它表现出一点诗的风格和特色。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复员回广州，司马文森同志约我合编《文艺生活》，由于一时缺稿，我除了继续写些短诗外，主要的精力转去写小说，第一个中篇小说《风砂的城》，在刊物中连载。此外，因为斗争和生活的需要，也写了不少杂文和议论性的文章。再后又写电影剧本。那时我是地下党领导的实际工作者，工作比较忙，所有的作品都是忙碌中挤出来的，直至建国后的一九五三年，才摆脱了行政工作，转而搞专业创作。

我在建国前后所写的杂文和议论性文章，数量也有二三十

万字，选集中一律不选，主要是想使选集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文风，所以只选了小说、电影剧本和散文。其中，建国前的小说，有中篇两个，短篇四个，电影剧本一个，散文二篇；建国后的中篇小说两个，短篇小说六个，电影剧本两个，散文十七篇，合共五十多万字。

对选集中的几个主要作品，想作一些说明。

首先是《风砂的城》，香港有评论家把它目为我的“成名”之作。是否称得上“成名”之作，我不知道。实际上我的名字早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只不过是那篇作品在《文艺生活》发表以后，因为作品的主人公是女的，写作上又是用第一人称的，国民党的黑名单上就把我看作女性，在这一点上也算“成”了“名”。这个作品问世后，也曾经有过一些读者的评论意见，却没有引起评论家的注意，结果还是默默无闻。现在，重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可能引起年青同志的不同议论。

《还乡记》的原名是《南洋伯还乡》。它和其他四个短篇一样，文笔比较粗犷，用了较多方言土语，与《风砂的城》截然不同。但它们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同情归国华侨和劳苦者的可怜命运，刻上了时代的烙印，政治上是可取的。作品所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是广州市郊曾遭受过日寇蹂躏的破落的农村，和破产的农民。他们在日寇统治下，熬过了七年痛苦的日子，盼来了胜利，结果是失望了，以胜利者自居的国民党老爷们，对老百姓继续进行迫害和压榨。抱着“落叶归根”想法的老华侨，失望之余，怏怏然地重赴南洋；一些贫苦农民在乡村活不下去，流进了城市，在黑暗的角落里过着贫困卑贱的生活；乡村里处处拉丁征粮，把农民驱进了绝境，他们被迫进

行了反抗。这是当时的真实生活。但我在描写农民的思想和行动时，缺乏阶级分析，使一些人的性格带有流氓性或小市民气习。这个问题，在我参加了土改以后，有所认识，才获得了解决。

土改后，我写过两个中篇小说，一个是《山村的早晨》、一个是《喜讯》，这都是侧面描画土改斗争的新人新事。这是我描写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生活的起点。集子里只选取了《山村的早晨》。其后，我到边防县当县委副书记，写了一个短篇《异地同心》、一个中篇《深圳河畔》。后者写好之后，牵涉到边防政策问题，没有送出去，直至打倒了“四人帮”，深圳辟为特区，政策开始有了改变的时候，才在《收获》杂志发表。它在我的抽屉里埋藏了二十多年，重新拿出来，还能使人看到边防线上的复杂情况。

余外的几个短篇：《前程》、《鸭寮纪事》、《假日》、《管水员》，都是写农村合作化的，所写的事情和当前的农村政策并不一致，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印上了历史的陈迹、群众生活的旧影。对待历史上表现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似乎不适宜于以当前的具体政策作为衡量成败的尺度。

我曾写过较多的电影剧本，个人创作的有《珠江泪》、《羊城暗哨》、《故乡情》、《雪夜》。与友人合作的有《椰林曲》、《南海潮》、《香飘四季》，还有一个与外国合作的大型纪录片《并肩前进》。这当中，《故乡情》拍了一半，因为当时《南方日报》一篇文章对改编的同名粤剧打了一棍子：《这是什么情》，连正在拍摄中的影片也打掉了，从此被埋没。现在把它选登在选集中，看它抒发的到底是什么情，可以让人们再作一番评议。《雪夜》

剧本发表于上海的《电影新作》，原来已选好了导演和主要演员，因某种原因也停拍了，我没有选进集子里。此外，《香飘四季》正在开拍时，被十年浩劫摧毁了，无法和观众见面。它和其他几个与友人合作的剧本，一律不在这本选集中选用。

于此着重谈一谈《珠江泪》。它是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那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支持一个新成立的电影公司而写的。我先写了一个详细的故事提纲，名字叫《贫贱夫妻》，蔡楚生同志看到了，写信约我到 he 家里叙谈。我依约去了，在他家里认识了王为一同志，一同在蔡家吃饭。蔡老对我的故事提纲十分赞赏，要我立刻写成剧本，由老王当导演。我说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不懂得“淡入淡出”那一套。蔡说：“你象写小说那样就行了，老王帮你分场。”他这一说，解除了我对电影剧本的神秘感。蔡又说剧名太实，建议我改一个题目，便主动地提出来，可以改为《珠江泪》或《白云红泪》。我觉得他改得很好，采纳了《珠江泪》。

当时香港的粤语电影颇为行时，一年出产二三百部，内容大都是宣扬封建伦理、宿命迷信、离奇神怪、打斗色情、低级庸俗的东西。而它们拥有众多的观众，香港、广东而至东南亚和美洲都有它的市场，新文艺工作者对此冷眼视之，不大闻问。蔡老主张《珠江泪》拍粤语片，要我写剧本时用粤语对白。那时，我正受了领导的嘱托，搞了个《粤片集评》，开始在粤语电影界中结交朋友，《珠江泪》拍粤语片，使我在朋友中增加了信任。

剧本在老王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蔡老对剧本中的粤语对白大为嘉许，认为语言鲜明、生动，具有性格化和浓厚的地方

特色。后来演员练习对话时，都觉得不落俗套，有新鲜感，与他们过去拍戏时所说的自发性语言，迥然不同，因此他们都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戏。

蔡老是这个戏的监制人，和老王一同选择演员，起用了寂寂无闻的话剧演员王辛、马孟平，和著名的硬派小生李清同任主角，又以著名的英俊小生张瑛以及陶三姑、周志诚、冯应湘等作为反面对手，这是非常大胆和冒险的作法。蔡老和老王如果不是对剧本心中有数，充满信心，是不敢这样做的。实践的结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个戏在第一流戏院公映时，轰动了全香港，打破了粤语片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纪录，在二三轮戏院放映时，场场都有十分强烈的掌声，受到了劳苦大众的热烈欢迎。解放初期在国内放映时，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曾获得中央文化部的“荣誉奖”。

一九七八年香港电影的评论家和文化工作者，举行过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展”，在一千八百部电影中，选看了一百四十部，当中选出最优秀的片子有十八部，《珠江泪》排列了首位。评论者认为它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上，对五十年代的香港粤语电影，“有非常远大和深刻的影响”，“为香港的影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带向一条健康、严肃的道路”。被誉为“粤语片里面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粤语电影的一个高峰”、“经典之作”。这些评价对它所达到的成就，虽有过誉之处，但它对当时混浊的粤语影坛，确是透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被评为“平实而深刻”、“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电影剧作，因为是粤语对白的，没有发表过。六十年代初期，电影出版社约我编一本个人的电影剧本专集，我曾将该剧中的

方言改为普通话，这么一改，对话显得有些逊色和别扭。十年动乱一来，专集也成了泡影。现在编在选集中，让它公之于世，不管评价如何，也算了结一件未了的心事。我在写作这个剧本的过程中，对剧中人物的苦难经历，如同身受实感，感情是十分真切的，不止一次地掉过眼泪。这也是我创作经历中的一个可贵的纪录。

另一个电影剧作《羊城暗哨》，与《珠江泪》的风格似乎并不一致，前者是表现主人公的机智和惊险事迹；后者是描绘主人公的苦乐和命运。它们带给观众和读者不同的感受。但我想说明，“羊”剧的剧作和影片并不一样，主要的区别是影片中的梅姨是一个女佣，而我剧本中的梅姨就是马老板，没有更神秘的人物了。导演以我的剧本为基础作了创造，我并不反对，实际上我不大喜欢过于惊险的情节。另一点是影片对陈医生夫妇的活动作了大刀阔斧的砍削，我的剧本依旧保留细致的描写。其结果，是各有特点。影片拥有许多观众，而我的剧本出了许多种版本，也算是畅销书。

这个故事是真有其事还是虚构的？引起许多人关心。实际是有真实部分，也有虚构部分。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一些反动地主、隐藏下来的土匪和流氓分子，自发地串连起来，组织一个联合国控诉团、要劫夺一艘轮船偷渡出国，被我一网成擒，这都是真实的。虚构的是，事实他们还没有搭上香港的特务线，剧本让他们搭上了，使潜进来的国民党特务指挥他们的活动。陈医生夫妇的线，也是虚构的。

我在创作这个剧本之前，曾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兼边委副主任，对边防上的斗争有所了解，也抓过偷进来的特务；后来又

到广州市公安局当办公室副主任，阅读了许多破案材料，也和局长们一同学习，研究案情，跟着他们去审讯，并和侦察员接触，一起去捕人。因此在一些男女特务的口中，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根据一个重要的案件，进行大胆的想法和虚构。从起草提纲到写成剧本，都和局长们研究，商量，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曾经问过薛焰同志：“在公安工作上有哪些东西不能写的？”他答道：“你大胆地想吧，你想得出来的东西，我们公安工作都有；我们有的东西，你是想不出来的。”经他这样一说，解除了我对公安工作的神秘感，使我脑海里扬起了想象的浪花。

事实上，《羊城暗哨》的所有人物和情节，都是真实的，不过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故事里罢了。有人说，八姑在那里劳改过，这同样是一种想象。

最后，关于选集中的散文部分，想说明一下。《走出马来亚》，是一九四四年春发表于桂林《大公报》的，发表时题目是《今日的马来亚》。文中说到一些维持会的头目是真姓虚名，现在连姓也虚了，变成×××，看来很不顺眼。这是避免他们的后代看到了心里不舒服。今天重读一下这篇文章，觉得这些真实的材料是很可贵的，日本侵略者在马来亚犯下的罪行，虽然只纪录了一点点，却是令人切齿愤恨。

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散文，引起人们重视的是《沙田水秀》，许多散文选集中都选上了它。也曾选进了教科书和作为外国入学中文的教材。此外有《复活的农村》等五篇，是歌颂当前农村新气象的，它们与《沙田水秀》相区别的是，“沙”文写了人物，文笔较为轻快，有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复”文等写得很

实，带有报道的性质。这主要是表现了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在党的开放政策带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真实的人物和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这些变化。希望通过这些变化，推动农村的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生产，为实现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农村作出新的贡献。

选集中的作品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不高，定然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读者同志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广州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辑 小 说

风砂的城.....	3
还乡记.....	99
小团圆	150
救济品下乡	164
兵源	177
受难牛	194
山村的早晨	200
深圳河畔	245
前程	330
异地同心	353
鸭寮纪事	380
广州之夜	395

第二辑 散 文

走出马来亚	417
异国乡情	432
盛开的玫瑰	448
香港纪行	452
福建前线散记	505
珠江岸边	524
沙田水秀	532
水乡探胜	541
竹棚佳话	551
南三岛小记	560
广湛道上	564
复活的村庄	570
农场春色	576
山野小影	582

第三辑 电影剧本

珠江泪	591
羊城暗哨	679
故乡情	780

第一辑

小说